

春秋總論初稿

毛起著

頁社出版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日發行

春秋總論初稿

(實價八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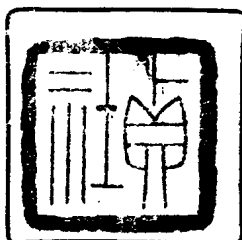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毛 起

發行者 眞 社
杭州龍翔橋六桂坊四號

特約
經售

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
生活書店
電話 九四四二六

版權所有



春秋總論初稿

序一

儒家之思想支配了我國人幾千年。我們現在要立說，要行事，都必須將這個思想來好好的理解一番。這不是因為他是我國「國粹」，或是我國「國故」，我們應得這樣做；其實是因為要我們的立說與行事，能在我國內應用，能發生效力，不得不這樣做的。

儒家是孔子所創立的。所以我們要理解儒家的思想，必須先明白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。對此問題，前人已給予我們以很多的答案了。漢人與前清的今文學家，以孔子為政治家。宋人以孔子為言性與天道之玄學家。今文學家康有為又以孔子為宗教家。但這些答案是非如何呢？我們以為他們之根據都在於相信六經是孔子所作，——前一種說法是本於春秋，而後二種則本於易經，——我們還不能即來接受他們。因為這個根據的本身，還大有問題，近世學者們頗有否認孔子與易之關係，而古文学家對於春秋還另有其看法的。所以在這個本根問題未曾解決之先，我們還不可貿然的說孔子是政治家玄學家或宗教家的。

所以我們還須更從別方面，來研究孔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。

章君太炎對此問題，曾有詳細的分析。在他答鐵錚書內，他以爲孔子是在我國「制歷史，布文籍，振學術，平階級」的人。雖他的說法，是注重于孔子在我國學術史上之影響一點，對於我們目前所要解決的孔子自身的問題，似乎還隔了一層。但影響是果，既有了果，我們便不難從果裏推出其因來，來定孔子是怎樣的人的。所以我們就以章君之說，來作爲我們討論孔子究竟是怎樣的人的材料。

章君以孔子爲布文籍的，說道：『周官所定鄉學，事盡六藝。然大禮猶不下庶人。當時政典堂在天府，其事蹟略具于詩書。師氏以教國子，而齊民不與焉。是故編戶小氓欲觀舊事，則固閉而無所從受。故傳稱「宦學事師」，「宦于大夫」。明不爲貴臣僕隸，則無由識其緒餘。自孔子觀書柱下，述而不作，刪定六書，布之民間，然後人知典常，家識圖書』。我們請先注意這個事實：章君以孔子之六經爲是從老子處拿了出來，散到民間的。這裏還只稱柱下，而在其諸子學略說一文（國粹學報二年廿期）內，却明白的說：『老子……徵藏故書，亦悉爲孔子詐取』。但這是斷然沒有的事實，不足置信的。我們以爲孔子斷無見老子之事；史記所說見老子之孔子，乃是子思，而非仲尼。關於此意，作者另在「依據史記來考老聃」一文中，加以說

明了，這裏就不贅說。即使不信這種說法，說是見老聃的不是子思，而是仲尼，我們也不能以爲孔子之六經，是從老子處取去的。因爲據莊子天道篇所記：『孔子西藏書于周室，……往見老聃。老聃不許，于是繙十二經以說。老聃中其說曰，「大謾。願用其要」』云云，是明明孔子去見老聃之時，已有十二經了，那當然是包括他的六經在內的，還何必向老子再去取。莊子說，還是孔子要以書藏到老子那裏去呢。又老子之言，也是沒有見過十二經的人的說話。再就他的資格講，他也根本不能有書。章君說孔子以前，只有貴臣有書。而老子不過是周室的一個柱下史。所謂柱下史，不過是柱下藏書館的職員；充其極，也不過是藏書館的館長，那能當得起「貴臣」之目呢？所以我們可以很堅決的說，孔子向老聃取書以散于民間，是斷無之事。劉師培與章君講學，大旨多同。但于此說，却並不取。他在「論古學出于史官」一文（見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一期）內，另作主張說，『孔子六藝之學，皆得之史官。周易春秋，得之魯史。詩篇得之遠祖正考父。推之問禮老聃，問樂襄弘，而百二十國寶書，又孔子與左丘明觀之周者也』。但劉氏此說，也並無有力之證據。此說只能應用於春秋；那確是取之魯史的。易就有點不確實了；因爲孔子所可向魯史取去的只有象，而非全文。詩若是從正考父取得的，那末只能有商頌，不能有三百

篇。況且正考父不是史官，和劉氏立說之原意，也不合。至于百二十國寶書，也非孔子和左丘明觀之于周的；而是孔子差子夏等十四人到周求得的。在什麼地方求得呢？可以從周史求得的，但也可以是不從周史求得，而另從私人方面求得的。我們無明證，不能說定其必是出於史官的。所以劉君之說，也是不足爲憑的。這樣說來，六經既不出于老聃，也不出于史官，可見其自始就在民間流行，爲衆人之所公用的了。孔子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于我老彭。」他所謂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就是指他的利用古書而言。而他却說竊比於我老彭，可見「我老彭」也是如此做的。（作者別有「考老彭」一文，茲不贅）更可見六經之行于民間，是自始卽是如此，並不待孔子之散佈的了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孔子對於六經之關係，不是將他們加以編定，加以說明而已；經他的傳授，六經因得保存下來，不至遇着了別書同樣的命運，散佚消滅，而已；並非是散佈之謂也。

章君之所以必欲以孔子爲散佈文籍的，則以他相信古代的人們要學，須從大夫去學；于是不得不去找住孔子，作爲一個轉換風氣的人物。但我們不信，這個從大夫去學之制度，確曾存在過。這個制度，其實只是秦始皇時，李斯所主張的「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」，這個制度，之一個迴光返照罷了。其合史實之希望是極低微的

。秦祚極短，李斯之主張有否實行，已很可懷疑。至欲以此爲周時的制度，自是更可懷疑的了。你們想，一國的大夫，其政事何等繁重；那裏還有功夫，可以教人詩與書？還有學在王官之說，與學術之傳播情形又不合。學術之傳播，終是由民間而王官，由下而上的；並不會由王官而民間，由上而下的。你們不要以這話只爲現代的現象，不能應用於古代。古代孔子之時，也正是如此的。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葬曹平公有說：『往者見原伯魯焉。與之語，不悅學。歸以語閔子馬。閔子馬曰，「周其亂乎！夫必多有是說，而後及其大人」。這不是說，必民間先有不悅學之說，而後其大人貴族也不悅學嗎？這個風氣之傳播乃自下而上嗎？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古代非吏無所得師的說法，除了一句空言之外，並沒有什麼根據，是不足信的。但當代學者們却還要以研究西洋學術史之結果，來相比附，爲此說張目。他們見西洋中古時代，學術思想之大權盡操於教會，遂以爲我國古代之諸子，也是出于王官。此說自梁啓超以下都主張之。但我們終不明白，爲何他們不想一想，中古時代不是西洋之最古時代？中古時學術思想，固出于教會；希臘時代之學術思想，豈也出於教會嗎？我們只見一般哲學家和科學家之在民間講授呢。所以我們可以總結的說，雖有西洋學術史之旁證，我國古代學術在于王官之說，還是不可信的。既然古代學術不在

于王官，自當在民間。既在民間，還何用有孔子來作分劃時期之佈文籍的工作呢？

何以謂孔子振學術？章君說，「九流之說，靡不出于王官。守其一術，而不徧覽文籍，則學術無以大就。自孔子布文籍，又自贊周易，吐論語，以寄深湛之思，于是大師接踵，宏儒鬱興，雖所見異塗，而提振之功在一」。章君謂孔子提振學術，是不錯的。但我們以為他的提振學術，並不是其將不能見之文籍，使人們遍覽的結果；而實是在自創一說，以號召羣衆，以為後人之「正動」「反動」，立其根基之地方。簡言之，是在孔子之始創儒學也。章君固然也帶說孔子之吐論語，但他意思所偏重的，乃在于布文籍方面。總之，他相信班志之說，以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。不以儒學為孔子之所特創的。這種態度，也是為一般學者之所共取的。劉師培也以為「儒之得源已久，非孔子之所創」。（見國粹學報二年廿三期，論孔子無改制之事一文。）但考他們此說之所本，則只在周禮之「儒以道得民」之一語。他們相信周禮是周公之書，見周公之書內已有儒字，遂謂儒早有了，而非孔子之所特創了。實則周禮是戰國時代之作品，所說的乃是孔子以後之事實。我們不可倒果為因，用以定儒之起原的。至儒學之確為孔子所特創，我們即在研究儒字之字義時，也就可以明白

的。儒字的原義，照說文是「術士」之稱。什麼是「術士」呢？術字據說文，爲邑中之道。則術士，就是邑中道上之士。儒，就是邑中道上之士了。這個字是頗能說明孔子在道上講授的事實的。史記記他去魯過宋時，和其弟子們，習禮于大樹之下。禮記射義，記他射于矍相之圃，觀者如堵牆。大樹之下，園圃之中，都是他在道上講授之好證。也以他在大路上講授，所以他的弟子，可以收得各種各樣的人物：顏涿父是大駟，子貢是市儈，……引得當時的人起了「夫子之門何其雜也」之問的。因爲孔子這個講授的特別情形，人們就爲他起了儒字之名；好像希臘人隨諾 Zeno 在街上大門下講學，人們就稱他的學派爲斯多噶派，Stoics 意思就是大門學派一樣。這個情形是只有孔子才能有的。因爲他出身卑賤，家裏又窮，不能像別人一樣，辦了很好的校舍，而只可以利用一點空曠之地的。所以我們說，儒學是孔子之所特創的，單看這個儒字就已可以明白的。

而章君却說儒家是有所出，是出于司徒之官。他的儒家出于司徒之說法，又是以司徒爲吏，孔子是師于吏的。這個說法之不可信，我們已在上文道及過了。現在請來一個事實之研究。孔子曾問官于鄭子，問樂于萇弘，他們都不是司徒；可見，出于司徒之官的說法，就是無稽之談了。即使承認了孔子無常師，他的許多師中有

一個司徒，爲我們今日之所能考出的，則司徒也不過是衆師中之一師耳；我們有什麼理由，來將他特別的提出來，而將其餘同樣重要的人，如襄弘鄒子等，一概抹殺呢？再即使孔子之學，確是專出于司徒之一官的，則我們也不能即以此，而否認孔子之有創造。因爲師即有所授，做弟子的可以接受了全部，或不與接受，或只接受了他的一部分；在這接受不接受的時候，弟子是有自決的自由。在這個自決的時候，他就要重新來一次創造的。所以即使承認儒家之學，專出司徒；我們也還是不能否認孔子之有創造的。而況出于司徒之官，是根本沒有此事的呢。

章君說孔子平階級道；『春秋以往，官多世卿。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，乃適遇王伯之君，乘時間起，平世絕矣。豈草野之無賢才，由其不習政書，致遠恐泥，不足與世卿競爽。其一二登用者，率不過技藝之官，皂隸之事也。自孔子佈文籍，又養徒三千，與之馳騁七十二國，辨其人民，知其土訓，識其政宜；門人餘裔起而干摩，與執政爭明。哲人既萎，曾未百年，六國興，而世卿廢。民苟懷術，皆有卿相之資。由是階級蕩平，寒素上遂，至于今不廢』。章君此說，以爲孔子是從事于政治者，要教其弟子們從事于政治的，真可謂能見其大。這個見解，要比馮君友蘭之說好多了。馮君在其「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」一文（見燕京學報第二期）內，

說孔子爲士之階級之創造者。所謂士的階級，就是不農、不工、不商、不仕、而只以講學爲職業，因以謀生活之人。我們要問孔子是真的這樣的一個士嗎？他所要造成的士也是這樣的士，沒有政治的意義的嗎？其實孔子之所欲造之士，還是馮君考士字之原義時所說之軍士，並非是專以講學爲事的後世所謂之士。你們看：儒者之服是帶劍的。再看子張說「士見危致命」。若不是軍士之士，會說這樣的話嗎？所謂軍士是直按和政治有關的，所以孔子之弟子，還是和政治有關的。馮君這裏所以致誤之由，是在以後人之目光看前人，而這個後人之目光，又是由于對於孔子教人之六藝兩字，誤解而來的。「六藝」兩字，自漢以後，幾完全成爲六經之代名詞。而其實此兩字，應依戰國之書周禮，解爲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、」的。若六藝就是六經，則禮樂本無其書，六藝不是只是四藝嗎？我們若將他解作禮樂射御書數，則就沒有這種困難了。孔子是長于此六藝的，所以他也就此六藝教人。你看他是極講究禮的：善爲容，鄉黨篇所記就是明證。曾問樂于萇弘，弦歌了三百篇，常與人歌，樂也是他所見長的。射呢，他曾射于矍相之圃，來觀者如堵牆，可見其射也是很有名的，他說：『吾何執？執御乎，執射乎，吾執御矣。』他于射御兩者之中，還以御爲更有把握，可見其御的本領了。書呢，是指一切典籍而言；意義和左

傳「觀書于太史氏，」文王世子「書在上庠」的「書」字相同；也正合于孔子所說的「天之將喪斯文」的文，內中包括詩，書，春秋，與易的。只有數，古代傳記裏沒有明說，大約是算術，孔子亦會得的。他說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所謂鄙事就是指這些。他以爲這些技藝都是當時國家所必須的，所以就以他們來教授。雖其中包有禮樂書數文事方面的項目，但也沒有忽略過射御之武事的。所以他的弟子裏，有能治軍的子路，有能說士見危致命的子張，和說戰陣無勇非孝的曾子；又有能挽六鈞之弓的顏高，用予之冉有，爲右之樊須，與於徹虎之宵攻之有若，這些都是孔門之士。而和後人所謂之門夫，沒有分別，不是孔門之士還是軍士嗎？不謂漢人專注重于書的一項，以六經說六藝，遂將孔子所欲造成的士，變爲一個讀書人，將武士的意義完全消失了。

至孔子自己之不僅爲一個老學究，非專以講學爲生的，則還有他的行事可以證明。他做過魯之司寇，周游列國，干七十二君，欲行其道，都可見他是從事于實際之政治運動的。他的一生理想，就在「夢見周公」一語裏，表顯得十分明白。周公是出名的政治家，而孔子欲見之；不是可見他的目的，也在做個政治家嗎？這本是明白不過的事。但歷來一般學者們因誤解六藝二字，遂以孔子爲是著作之老儒，將他

的政治意義完全抹殺。最可奇的，這個影響乃間接的又及于周公之身上。他們以爲爲老儒孔子之所夢見的，一定也是一個著作之老儒；于是遂有周公作禮，和周公制六經之說，將他的政治人格也完全改換了。這真可說是殃及池魚，無妄之災了。

從上所論看來，我們可以說孔子是一個深入于政治的人；政治思想，浸透了他的靈魂的。他的行事是政治的；他的言論，是政治的。既是如此，這個結論，自也應適用於春秋的了。而章君却說，孔子作春秋是制歷史。說道：『往者尙書百篇，年月閭略，無過因事記錄之書；其始末無以猝覩。自孔子作春秋，然後紀年有次，事盡首尾，丘明衍傳，遷固承流，史書始粲然大備。槩則相承，仍世似續，令晚世得以識古，後人因以知前。故雖戎羯荐臻，國步傾覆，其人民知懷舊常，得以幡然反正。』章君這個說法，擺在孔子之全人格內，在我們看來，是大不相稱的。此稿之作，就是要來說明我們之這個立場，將孔子之春秋從歷史裏拔出來，而重行安到政治裏去的。

序二

我少時在家塾裏讀完了論語孟子，就讀左傳。讀左傳時，常常翻閱公羊與穀梁二傳。每到三家之解釋春秋處，我頭面就發起熱來。一時裏常是這樣的想：孔子之春秋是紀事的，文字何等簡潔，又何等明白，而三傳却說褒說貶，弄到人們無從理解，團團而轉；真是多事。一時裏想到孟子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言，則又自慰似的說道，或者春秋裏確有褒貶，如三傳之所說的。但一到拿起春秋來時，則從前之憤忿輒又重現出來。如此的忽暗忽明過了幾時，我決定似的說道，我們所信的孔子作春秋之說，中間一定還有曲折，不似我們所想像之簡單的；這裏定有一個問題的。以後這個問題，遂時常往來於心中。及後進了學校，雜治各種科學，這個問題，乃全拋諸腦後了。一九二四年在美國，一時裏會寫信回國給亡友陳行叔，請其代買幾本講舊學之書寄來。行叔以爲我要做一篇講今古文之論文了，復信中微微的諷動我說，今古文的問題，做起來恐怕是很費時的罷。其實我當時那有這個存心呢；不過在國外亦頗樂得有國文的書籍，看看散心而已。後來一九二五年九月到法國，應學校之要求，我倒確想做本講孔子的書，和一本講春秋的小冊子。於是從前

之對春秋之疑問，又正式的提起來了。是十一月的一日罷，我在房內看崔適之春秋復始。看到序證節內，說漢人所說之春秋是公羊傳的地方，心中忽忽如有所觸，覺得這是與我之問題有關的。但終說不出是什麼來。經一夜的冥想，亦無所得。次晨起來，到盧森堡公園裏散步。我正繞着噴水池走時，忽然立住自語道，那末孔子之作春秋，定是作春秋之傳了。那時我真高興極了，覺得春秋之一切難題，都解決了。以後以此觀點，到法國國家圖書館裏看書時，常能得到左右逢源之樂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行叔要赴英國，路過巴黎。我在北京飯店裏，意外的遇見了他。他鄉遇故知，又是久別。我那時的快樂，真非是言語所能形容的。原來行叔於動身赴歐之前，曾有一信通知我，要我到馬賽去接他。而我以搬了棧房，又到比利時去旅行之故，沒有收到他的信，以致於他之到來，沒有幫過一點忙，抱歉得什麼似的。但一經回想，却又跳起來道，設是我收到了他的信，預知他當於何日到來，則我今日之見他，也只是一件平凡之事而已，那裏會使我生行叔自天而降之突兀之感呢？以此自解，遂也安心。以後我們就談起別後的情事，和將來的計劃來。我勸他改計住在巴黎，不必到英國去了。他也勸我不必再繼續研究哲學做論文了；應改習政治與經濟。我聽了他，遂多讀了幾部社會科學之名著。但還是不能忘情於哲

學。一日謂行叔道，『你不要爲我研究哲學而担心，恐怕我將來做一個「智識階級」之一員。我之研究，也是要歸宿於倫理和政治的；和你之講政治與經濟並沒有什麼根本之不同啊』。他也遂從此不再言。

我們自此日夜見面。有一次星期六的晚上，在吳君房裏，我對他道，『行叔，你所最討厭的國故問題，我今天可以爲你解決一部分了。』因將對於春秋之意見，說了一番。行叔當時不語許久，後來方慢慢的回答道，『歷史上字義之演變，是常有的事。春秋也許是如此的。』又一夜，我們同在蘇福羅咖啡館裏 Cofé Soufflot 喝咖啡，我又談起春秋時的曆法來。我們興趣都很高，雖在樂聲裏對談，而我們之說話，却還是歷歷可辨的。

到巴黎的第二年，行叔遷到方脫內 Fontenay 鄉間去住。於是我們相見的次數，不能有以前之頻頻了。他到巴黎來的時候，我們終是談起別的問題，不復論及春秋。但有一次他來時，說道，『無止，你不覺得寂寞嗎？何不寫一些文章呢？』我說，『我近來愈覺空虛，並沒有什麼可寫。』他說：『卽如你的春秋之意見，實有發表之價值的。我想，這確是可以解決我國學術史上之一大疑案的。』但我終于不會着筆。一九二八年春，我奔母喪回國。行叔送我時又說道，『無止此去，應多多的』

做文章。第一是春秋問題，應先發表的。」當時我自然唯唯的答應。但返國以後，人事委瑣，家庭多故，母喪才六月，吾兄又繼亡。當時連做人的興趣也沒有，自然談不到做文了。後來我去廣州，而行叔還留在巴黎，通信很少。直至一九三一年一月，他又寫信來，叫我譯柏格森的著作。我自然也沒有動手。不料過了三月，他竟在法國「短命而死」了。

我之素性，本就不喜做文；以爲這是搬現成的東西，不足貴。所足貴的，是在不絕的創造。問題和解決不論大與小，在那創造之頃，乃能使我們銷魂大悅，乃能使我们達到人生之真實。過此一刹那，便又退在物質界裏；方才之創造，又變爲糟粕了。新世界無限，我們創造之不遑。更那有閒歲月，去做整理舊東西之工夫呢？以此之故，我到現在，還不曾做過什麼文章。二三十年來之光陰，盡是銷磨於冥思幻想之中。其未得之也則終日彷徨，頭熱失眠。及一旦恍然有悟也，則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了。那時候，若有一二友人到來，則就與之興高彩烈的一談而已，從不肯退而筆之於紙上的。年來深思行叔死事之意義，常與我以無限之警戒。以行叔之年少好學，聰明絕人，若天假之年，則其學問上與事業上之造就，當不可以數量計；而今忽短命而死，一切希望，一切至精至美之思想，都非復是此世之有矣。豈